

后工业社会的来临

——对社会预测的一项探索

〔美〕丹尼尔·贝尔 著

商 务 印 书 馆

后工业社会的来临

——对社会预测的一项探索

[美] 丹尼尔·贝尔 著

高 钰 王宏周 魏章玲 译

高 钰 校

本书为内部参考资料

文章引用时务请核对原文

并在注明出处时用原著版本。

商 务 印 书 馆

1984年·北京

Daniel Bell
**THE COMING OF
POST-INDUSTRIAL SOCIETY**
A Venture in Social Forecasting

Basic Books, Inc., Publishers

New York, 1973

本书根据纽约基础图书出版公司1973年版译出

内 部 发 行

HÒU GōNGYÈ SHÈHUÌ DE LÁILÍN

后工业社会的来临

——对社会预测的一项探索

〔美〕丹尼尔·贝尔 著

高 钰 王宏周 魏章玲 译

高 钰 校

商 务 印 书 馆 出 版

(北京王府井大街36号)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三河县二百户印刷厂印装

统一书号：4017·310

1984年12月第1版	开本 850×1168 1/32
1984年12月北京第1次印刷	字数 423 千
印数 9,900 册	印张 17 1/4

定价：2.40 元

译者前言

未来研究和社会预测在五十年代开始出现，自六十年代以来日益成为西方国家学术界热烈讨论的课题。其中，美国著名社会学家丹尼尔·贝尔提出的“后工业社会”的预测性分析受到了各方的重视。

丹尼尔·贝尔在四十、五十年代主要从事新闻工作，曾任《新领袖》杂志主编、《幸福》杂志编委和撰稿人。同时还在芝加哥大学和哥伦比亚大学讲授社会学。这一时期他的主要著作有《美国的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史》、《美国的新右翼》、《激进的右翼》等。在六十、七十年代他主要从事教学工作，曾在哥伦比亚大学和哈佛大学任教。同时，还从事一些与未来研究和预测有关的活动：曾与欧文·克利斯托尔合编《公共利益》杂志；担任过《代达罗斯》和《美国学者》杂志编委；1964—1966年在美国总统的“技术、自动化与经济进展委员会”内供职；1966—1968年担任美国政府“社会指标委员会”两主席之一；1966—1974年担任美国文理科学院的“2000年委员会”主席；1976—1979年任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国际未来计划”的政府间顾问委员会美方代表，后任美国总统“八十年代议程委员会”委员。在这20年中，他的主要著作有《意识形态的结束》、《普遍教育的改革》、《走向2000年：进展中的工作》、《大学的对峙》、《今日资本主义》以及《资本主义的文化矛盾》等。

1959年夏季，丹尼尔·贝尔在奥地利的一次学术讨论会上首次使用“后工业社会”的名称，提出了他对未来社会的设想，其后，在1962年和1967年又写了《后工业社会：推测1985年及以后的

美国》和《关于后工业社会的札记》[I]和[II],乃至1973年出版了现在摆在读者们面前的这部系统论述“后工业社会”的代表作。

其后,西方学术界论述未来社会的著作日益增多,其中许多见解在贝尔的影响下套用了“后……”的前缀,以表示一个旧时代的结束和新阶段、新类型社会的开始。从下列一部分名称可以窥见这股思潮的概貌和色彩:“后资本主义社会”——拉尔夫·达伦多夫,“后现代社会”——阿米泰·艾特奇奥尼,“后大规模消费社会”——赫尔曼·卡恩等,“后匮乏社会”——《社会政策》杂志,“后福利社会”——吉迪恩·绍伯格,以及“后社会主义社会”——阿兰·杜汉纳,等等。这些未来预测的一个共同特点是,它们都以当前突飞猛进的科技革命作为出发点。

在本书中,贝尔以美国作为实例,致力于未来西方社会社会结构与政治影响的研究。在其后的《资本主义的文化矛盾》一书中,又继续探讨“后工业社会”与文化的关系。他提出“后工业社会”的五大基本内容是:(一)在经济上,由制造业经济转向服务性经济;(二)在职业上,专业与科技人员取代企业主而居于社会的主导地位;(三)在中轴原理上,理论知识居于中心,是社会革新和制定政策的源泉;(四)在未来方向上,技术发展是有计划、有节制的,重视技术鉴定;(五)在制定决策上,依靠新的“智能技术”。

贝尔在对未来西方社会的探索中,从技术分析联系到产业结构、社会结构、阶级结构、权力中心、管理体制等方面无疑是具有重要意义。现代的科学正在经历一场巨大的革命,这已是无可否认的事实。我们对这场重大的科技革命,不但要重视其经济影响,而且要重视其社会影响。所以贝尔的分析和预测相信会引起我国读者的兴趣。

作者提出了一些有价值、有意义的分析,但书中也有若干观点和论断是我们不能同意的。例如,作者企图借促进生产率大提高

的科技革命来鼓吹资本主义“相对长命”和“免于崩溃”；又如，作者企图以“前工业社会”、“工业社会”和“后工业社会”的划分来抹杀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种制度的根本分野，说“继续谈论资本主义或社会主义已没有什么意义”；有的提法更是对社会主义制度的明显的曲解。

应该看到，科技革命的发展和生产力的大提高，必将为社会发展和变革创造条件而不会使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同归于“后工业社会”，也无法使资本主义摆脱其日益深化的固有矛盾。作者在本书中也不得不承认：西方社会正处在巨大的动荡之中，现有的社会关系、权力结构和资产阶级文化都在迅速消蚀，因此，“时代终了感”是当代资本主义特有的文学形象。他预感到“后工业社会”在解决一些老问题的同时，会带来一整套“新的匮乏”和一系列“新的问题”。

本书翻译分工如下：前言，高钰；导论，王宏周；第一章，高钰；第二、三章，王宏周；第四章，魏章玲；第五、六章，王宏周；结语，高钰。

高 钰

1984年2月

目 录

前言	1
导论	7
方法论补记	14
后工业社会面面观	18
后工业社会思想形成史	43
本书的计划	50
第一章 从工业社会到后工业社会: 社会发展的理论	57
马克思的两大图式	64
后马克思主义: 西方的对话	73
马克思主义: 官僚政治的问题	92
苏联: 官僚政治和新阶级	99
社会发展: 莫斯科的看法	115
捷克对未来的看法	121
后工业社会: 一种概念性图式	129
第二章 从商品到服务: 不断变化的经济形态	138
工作部门和职业	145
后工业社会的某些劳工问题	160
教育与地位	160
黑人	162
妇女	163
非营利部门	164
“新”工人阶级	166
变化的局限性	173

第三章 知识和技术诸方面：后工业社会中新的阶级结

构	186
变化的速度	187
规模的变化	191
知识诸方面	195
知识的定义	195
知识的计量	198
知识的分解	208
技术变化的计量	211
现代化和技术变化	211
经济变化的计量	213
对技术的预测	220
知识社会的结构	239
知识阶级诸方面	240
科学精英人士和一般人员	250
受过高等教育者的未来形象	260
体制结构	272
资源分配	280
结论	294

第四章 公司的从属性：经济化方式和社会学化方式之

间的紧张关系	299
新的批评	303
经济化方式	305
公司：一种新的社会发明	307
经济化方式的局限性	310
国民生产总值，私人成本和社会成本	312
社会学化方式	315
各种规划	317
作为社会学机构的公司	320

义务的权衡	322
公司的转折点	325
私有财产还是私有企业?	327
“公司”的含义	329
从艰苦奋斗到平淡无奇	331
第五章 社会选择和社会计划: 我们的概念和工具的适	
应性	334
社会抉择和社会价值: 需要新的计算方法	335
集团政治和个人领导	343
数量, 相互影响, 密度	348
扩散和比例的变化	353
社会单位的适当规模和范围	356
公共与私人	358
社会结算系统	361
制定计划的工具	366
什么是社会指标?	371
时代的展望	374
第六章 “将来由谁统治?” 后工业社会中的政治家和科	
技治国论者	377
范例	378
时间机器	381
出生年代	383
科技治国的思想观点	385
物支配人	388
军人支配物	392
由谁掌权?	397
政治角逐场	403
结语 未来的议程	407
一、社会制度是怎样改变的	407

二、科学的未来	416
科学的精神气质	416
科学的政治	425
三、能者统治与平等	450
取消学校教育	462
对平等重新下定义	467
反对能者统治的问题	470
卢梭和人的虚荣	478
穆勒和代议制逻辑	481
罗尔斯和公正	485
对能者统治重新下定义	492
一种公正的能者统治	498
四、消灭匮乏?	504
新的匮乏	515
五、文化与意识	526
政治组织作为仲裁人	532
国际背景	534
结论	538
译名对照表	542

前 言

阿诺德·托因比^①认为,自从人类聚居点出现以来(或者说自从有这方面的文字记载以来),已经经历了 21 个不同的文明,作为一种文化统一体的西方社会是其中之一。但是西方社会本身就是一幅宏大的历史画卷。在西方社会内部,有着令人眼花缭乱的形形色色、相互交织的成分,不论是宗教的分化、政治帝国的兴衰,或者是社会—经济制度的相继。社会学家或历史学家的任务就是要制订出一种明白易懂的研究方法。

在某一时空范围内,人们可以认清各种社会的共同结构特征以及更加持久的变化格局。当然,这些都要有某种程度的概括。

但是,这样一种分析办法有可能使某一特定社会和某一特定世代的历史中突出的、有意义的事物趋于湮没。(托洛茨基曾经说过,五十年的时间,对一种社会制度的整个长度来说,是非常短暂的;可是,这对一个人来说,则几乎是他具有意识感的整个生涯了。)所以,观察一个特定社会(由共同的历史和气质所联结的、组织在同一政治主权下的地区单位)的盛衰,探索它丰富而独特的命运,可以根据这个社会的历史、它的人民的性格、它的“民族意志”等等来进行。

但是,同样显而易见的是,每个社会的历史虽然可能是各个不同的,但它和别的社会也具有许多共同因素——宗教、文化、经济、

^① 阿诺德·托因比(1889—1975)是英国历史学家,在古代史和现代国际关系史方面有很多著作,最著名的是历史哲学方面的巨著《历史的研究》12卷,其中强调不把国家作为孤立的单位来研究历史,而要研究整个文明——21个已为历史学家熟知的文明以及5个“化石”社会。——译注

技术——这种因素深入于一个民族的特定社会组织，并以特殊方式对他们发生影响。西班牙的天主教教义类似爱尔兰的天主教教义，但也有不同之处。为了某些目的，我们可以集中注意天主教教义的共同因素；为了别的目的，可以集中注意造成不同之处的民族特点。美国资本主义和日本资本主义有相似也有不同（诸如在管理方法和对工人的责任等重要方面）；一个人的目的决定了他注意的中心。

在本书中，我用“工业社会”作为研究的概念单位。工业社会这个概念包括了十几个不同国家的经历，纵贯诸如美国和苏联这样一些对立社会的不同社会制度。工业社会是围绕生产和机器这个轴心并为了制造商品而组织起来的；前工业社会依靠原始的劳动力并从自然界提取初级资源。工业社会在生活节奏和工作组织方面就是现代西方社会社会结构（即：经济、职业体制、阶层体制）的特定含义。根据我的定义，社会结构在分析上有别于社会的另两个方面：政体和文化。

可是，“工业社会”这个词，如果静止不变地使用的话，就象“资本主义”一样会使人误解。正如二十世纪的社团资本主义和管理资本主义是和十八世纪和十九世纪的家庭资本主义有很大不同，所以依靠技术和科学的二十世纪工业社会是和前两个世纪的制造业社会大不相同的。没有一个社会制度（或者民族社会）对未来掌握专利，而社会学的问题就是要认识变化的性质和（如有可能）道路：推力和阻力，加强因素和破坏因素。

本书提出的命题是：在今后 30 年至 50 年间，我们将看到我称之为“后工业社会”的出现。正如我所强调的，这首先是社会结构的变化，其结果在具有不同政治和文化构造的社会中将有所不同。然而，作为一种社会形态，它将是二十一世纪美国、日本、苏联和西欧社会结构的一个主要特征。关于后工业社会的思想现正处在抽

象概括的水平。

我用美国作为说明问题的单一例子，这不仅因为它是我所最了解的，而且因为那里的变化过程更为先进和明显。它还使我在以社会学角度进行概括的同时，能处理一些特定情况并有直接观察和了解之利。

马克思认为英国(他以此作为资本主义工业社会的例子)的命运预示了一切社会的命运,但我不象他那样看,我不相信有什么命定性的道理。后工业社会不是促进“上层建筑”变化的“下层结构”。它是社会的一个重要尺度,它的变化对于在社会上起仲裁作用的政治体制造成管理上的问题,正如文化和生活方式的变化造成同传统的对立,又如新的社会集团的出现以及社会地位低下的集团出头露面在社会上提出了权力问题和特权分配的问题。

这是一种二十一世纪的看法。试图在方法论上采用一种新的理性分析,一种中轴原理和中轴结构的分析,作为一种把多得令人头昏目眩的宏观历史变化的可能前景“加以条理化”的办法。这种做法在实践上就是把社会中结构变化的实质特点认定为来自经济的变化性质,以及理论知识确定社会革新和变化方向的决定性作用。这是对未来的探索。

约翰·杜威在《经验的艺术》一书中写道:“在任何思想的试验过程中,只有当结论已日益明显的时候,前提才会出现。”关于后工业社会的思想,情况就是这样。本书中的各章是在最近五年中写成的,但是我在此以前的五年左右时间里已经在不断蕴酿这一想法了。由于这是一种推测性的思想,讨论的是未来社会的各种不同可能性,因此不可能有一种单线发展的论点,而只有对各种主题加以探讨。每篇论文是在不同场合写成的,但每一篇又作为一幅拼版构图的一部分。我在最近两年中又把这些论文加以重写,突

出其相互关系并指明后工业社会思想的五个方面。所有这些都
在导论内详细地加以阐述。此外,我还写了一篇四万字的结语,探讨
在今后几十年中后工业社会必须面对的主要问题。这篇前言的目
的是向助成本书的人们和机构表达我的感激之情。

关于后工业社会的思想,最初是在 1962 年波士顿一次讨论技
术和社会变革的座谈会上一篇没有发表的长篇论文中系统地加以
阐述的。座谈会的主席是罗伯特·海尔布伦纳,我要感谢他当时
发表的意见以及十年来陆续进行的一些讨论。

1965 年,卡内基公司给了一小笔赠款来研究这一思想,这使
我能够获得一些研究资料,并得到亨特学院哲学系弗吉尼亚·赫
尔德博士为期一年中一部分时间的帮助。赫尔德博士写了一些备
忘录,其中有些已经收在“2000 年委员会”的工作文件中,有些我
已经在本书第 5 章中采用。同赫尔德博士的讨论对于我这一思想
的早期阐述是重要的。

后工业社会的思想成了美国文理科学院“2000 年委员会”
的“基本路线”之一,并在该会发表的 5 卷《工作文件集》和《走
向 2000 年》(该委员会在 1967 年的一本文选)中得到反映。我感
谢美国文理科学院执行主任约翰·沃斯的大力帮助;感谢《代达
罗斯》杂志主编斯蒂芬·格劳巴德,他是我在学术上的长期同伴,
这些思想中许多内容我曾经和他讨论过,并以他的广博历史知识
来作印证。

在团体机构方面,我最感谢的是拉塞尔·塞奇基金会及其会
长奥维尔·布里姆。1967 年,该基金会的一笔赠款首先使我摆脱了
在哥伦比亚大学三分之一的教学任务,使我能在哥伦比亚大学就
预测方式问题组织一次试验性的研究生讨论会。该基金会还在其
后几年中对我的研究工作给以资助。我利用 1969—1970 年的休
假年在该基金会担任访问研究员,本书就是在那里开始成形的。

其中的第3章，当时在形式上有所不同，题目叫“对知识和技术的衡量”，登在拉塞尔·塞奇基金会的埃莉诺·伯纳特·谢尔登和威尔伯特·穆尔主编的《社会变革的指标》一书中。我要特别感谢谢尔登博士对那篇论文发表的编辑意见。

在过去的十年中，我对若干重叠交叉和互不相同的学术问题感到兴趣：对后工业社会的研究、社会指标的发展、对长期社会预测和2000年的兴趣、社会变革理论评价、把中轴结构作为组织宏观社会学领域的一种方法以及对于我称之为文化与社会脱节的巨大关心。我一会儿搞这个题目，一会儿搞另一个题目，有时用这些粗糙的草稿发表一些小文章，拉塞尔·塞奇基金会对我这些情况是很表宽容的。本书是将在今后几年中陆续出版的若干著作的第一本，这些著作可把我关注的那些问题连贯起来。我要感谢奥维尔·布里姆的耐心，相信他将从本书得到一些报偿。

1970年6月，拉尔夫·达伦道夫和我在苏黎世组织了一次小型的国际讨论会，那是由国际文化自由协会发起的，专为讨论后工业社会的问题。本书第6章是形成那次讨论会基础的论文。其后，牛津大学纳菲尔德学院的琼·弗拉德博士、索邦大学的弗朗索瓦·布里考德教授、佛罗伦萨大学法律系主任吉奥瓦尼·萨托利教授、伦敦经济学院的彼得·怀尔斯教授和东京大学的富永健一教授都写了若干批评性和不同意见的论文。这些论文发表在1971年冬季号的伦敦《述评》杂志上，感兴趣的读者可以从中得到教益。^①

我对于我的朋友欧文·克里斯托尔更是亲身抱有长久的感激之情，他虽然对所有的社会科学、特别对大规模概括的办法抱有怀

^① 其他的论文撰写人还有希伯来大学的S. N. 艾森斯塔特、伯克萊的莱因哈德·本迪克森、哥伦比亚的兹比格纽·布热津斯基、巴黎的米歇·克罗齐埃、特拉维夫的齐格蒙·鲍曼、巴西的埃路·雅瓜里贝、耶鲁的胡安·林兹、巴塞尔的奥塔·锡克、查塔姆学院的肖恩菲尔德、埃塞克斯的戴维·洛克伍德、哈佛的斯坦利·霍夫曼以及马萨诸塞州坎布里奇的斯蒂芬·格劳巴德。

疑,可是对我的每篇论文都严格、认真地加以关注,并坚持它们在内容表述上应有美学的标准。

我在拉塞尔·塞奇基金会的秘书维维安·考夫曼以及我在哈佛大学的秘书安·梅里曼夫人都具备作家们衷心期望其秘书所具有的品德。玛丽·塔维蒂安小姐为结语打了字。劳工统计局的尼尔·罗森塔尔不倦地协助提供第二章中的一些统计数据。朱迪思·伯班克夫人对第三章中的一些统计提供了最新数据。我的朋友和以前的编辑安妮·弗里古德夫人阅读了文稿并对内容提出了有益的建议。基础图书出版社的里贾纳·沙赫特详细审读校样,对我极为耐心。

没有一个作家能对自己的文章作出正确判断的,对我最严厉而又爱护的批评者是我的夫人珀尔·卡津·贝尔,她把我的文稿全部进行了校订。

丹尼尔·贝尔

1973年3月于马萨诸塞州坎布里奇

导 论

这是一篇关于社会预测的论文。但是，人们可以预报未来吗？这样的问题容易使人产生误解。只要根据逻辑推理认为不存在“未来”这样的问题，那就不可能预报未来。按照这种方式来使用术语，是为了使它具体化，为了假定这样一个实体是现实存在的。^①未来这个词是表示关系的术语。人们只能讨论某件事情的未来^②，本文探讨的是先进工业社会的未来。

预测不同于预报。虽然二者的区别是任意作出的，但必须确定下来。预报通常有关一些事件，例如：谁将在某次竞选中获胜，某个国家是否会打仗，谁会打赢某次战争，某项新发明的特点是什么，等等；预报集中于作出决断。然而，这类预报虽然有可能作出，却不可能公式化，也就是说，不可能使其受一些规则的支配。事件的预报本来就是困难的。事件是社会矢量（利益、力量、压力之类）的交叉。虽然在某种程度上人们可以分别估计这些矢量的强度，但需要有一个“社会物理学”来预报它们确切的交叉点，在那里，决

^① 罗伯特·尼斯比特在他的论文《未来学有未来吗？》中写道：“未来学的本质是：未来决定于现在，正如现在曾经决定于过去一样……在我看来，未来学的基本之处是那种动人的、然而却是完全虚妄的假定：把时间的连续性同变化的连续性或者事件的连续性配合起来”。（引自《文汇》1971年11月号，加重号是原来的。）用一句古老的俄国谚语来说，尼斯比特先生是在推开一扇敞开的门。他已经提出了一系列比喻——未来、时间、变化——但没有提到内容或关系，以致这些词之间的不协调性会轻易地形成。方法论的问题就是那种对不同类型社会现象的预测。因此，我从来不喜欢或不使用未来学这个词，它在实质上是没有任何意义的。

^② 这是一种常见的混乱。例如，人们听到很多关于意识或意识提高的谈论。然而正象威廉·詹姆斯很早以前就指出的，根本就不存在什么意识，只存在对某种事物的意识。（见《心理学简明教程》第2章“意识流”。纽约，1961年；初版于1892年。）